史评史源

社会空间的生产：解读《中国西部开发与近代化》

牛晶晶

对空间颇有研究的福柯，在其《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Texts/Contexts of Other Spaces）中也指出，“19 世纪最重要的着魔（obsession），如我们所知，乃是历史：以它不同主题的发展、中止、危机与循环，以过去不断积累的主题，以逝者的优势影响着世界的发展进程。而当今的时代或许应是空间的纪元。我们身处同时性的时代中，处在一个并置的年代，这是远近的年代、比肩的年代、星罗散布的年代。其中由时间发展出来的世界经验，远少于连系着不同点与点之间的混乱网络所形成的世界经验。在西方经验中，空间本身有它的历史，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时间与空间不可避免的交叉。”①社会现实不是偶然成为空间的，不是存在“于”空间的，它在先决条件上和本体论上就是空间的。不存在没有空间化的社会现实，也不存在非空间的社会过程。②我们在探究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决不能忽视制度背后所涉及事物的地理活性。③

戴逸先生和张世明先生主编的煌煌近 70 余万言的集体著作《中国西部开发与近代化》一书最近由广东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可谓立足学术、着眼现实、史料详实、立论创新，代表着我国学术界在这一领域的最新研究水平，弥补了以往前人在此方面研究的不足和缺憾。综观全书，以下几个学术特点非常明显：一、在研究内容上采取“问题史学”的理念，紧紧围绕“中国西部开发与近代化”这一主题线索展开，在表述方式上采取“叙事史学”的手法，将思想和观点的阐述完全融入于对历史事实的叙述，通过平实的历史叙述揭示研究者对目前学术界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回应。二、在全书的书写与叙述角度上采取从空间的视角出发，以西部的空间镜象为叙述主线，致力于区域社会史的研究，力图打破以往学术界单一的以时间为主线的线性叙述结构，试图从空间所具有的延展性、空间网络渐进密化格局的形成以及时空之间的互动关系等诸多因素，以多元的空间特征展现近代西部开发的复杂性，从时空二维的深层结构中揭示旧的传统与新的事物纠葛并呈状态。三、在研究的立场上，作者始终将自身放置在边疆社会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去探寻边疆社会自身的演进及其与中原社会的互动关系，从而打破了以往学术界固化的以中原视角看边疆的误区，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更加真实、生动的西部边疆社会。四、作者非常注重从微观角度、看似非主流因素入手去体察西部社会变迁。如全书专设一章，着重探寻移民社会空间格局的变化，给予下层移民社会以更多的关怀。五、作者论述不仅仅局限于西部经济开发，而是将西部经济开发、生态环境变迁、近代化三者之间的互动

[**收稿日期**] 2006－6－25
[**作者简介**] 牛晶晶（1981—），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2005 级博士生；北京 100872

关系同时予以关照和考量。该书以生态环境为本位，将西部近代化过程置于生态环境的语境中，逆向思维去探讨生态环境的变迁对西部近代化、经济开发所产生的影响，体现了作者关注生态环境，提倡人与环境和谐发展的思想。六、全书在大量收集原始档案材料，所用史料丰富、详实的同时，还大量参考西方理论著作，利用西方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空间与权力等诸理论，对原始史料进行深度透彻的分析，可谓有史有据，提出了自己很多独道的见解。《中国西部开发与近代化》可以说是一本学术价值甚高、信息量丰富、值得仔细研读的力作。

“西部”一词在不同人的心中、不同人的想象中都是不尽相同的。作为一个当代人，对西部的理解也必然与古人眼中的西部大相径庭。此书的开篇，作者便将“西部”放置在区域史研究的范畴之内，从语词学的角度，对近代以来“西部”这一话语背后所蕴涵的空间感觉的变化与重构给予了系统的分析。作者首先指出“任何空间方位所指都是具有话语主体的本位立场预设的”。正如萨义德《东方学》中所述，西方最初占领东方，以西方自身为中心，将东方构置于西方的思维模式下，是在西方政治结构、经济模式、社会道德等方面影响下“假想”出来的东方，而非真正意义上“独立”的东方。这种对东方的理解——知识，左右了其权力的实现，是客体的东方，而非主体。那么，中国人长期以来受“正统观”的影响，存在着“中原中心观”的心里阴影，所谓古代“一点四方”，都是以中原汉文化为本位，而将边疆视为中原的从属地位。因此，“西部”一词的由来，本身就具有从中原看边疆的，将边疆视为客体的浓厚的话语本位立场色彩。作者认为边疆史研究应破除以往学术界固化的以中原视角看边疆的误区，而将自身放置在边疆社会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去真切的探寻边疆社会自身的演进及其与中原社会的互动关系。

琼斯（Jones. S. B）统一领域理论中揭示的思想——区域链的分析框架，对思想观念乃至政治制度的建构与西部空间变化之间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进行剖析颇具指导意义。《中国西部开发与近代化》一书指出：清初，清人对新疆、西藏的地理认识十分匮乏。虽有后来康熙年间《皇舆全览图》的绘制，然所绘新疆、西藏之地，远不及内地及满蒙图之精确，地图上所标示的地名寥寥无几，多为空白。随着嘉、道、咸时期西方帝国主义势力的渗透，受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以及作为清王朝帝国知识工程的有机组成部分，西北史地学研究呈现蔚为壮观之景，先后涌现出一大批以西北史为研究对象的学者和著书，不仅开拓了当时人对西部的时空视野想象和思维空间，同时也为近代爱国之士探索民族复兴道路以及民族国家的建构提供了思想的萌芽。降及清后期，边疆地区藩部色彩逐渐被削弱，边疆与内地的行政一体化过程加剧，在经济开发深入和思想认识深化的双重因素作用下，近代以来中国西部地区的行省建制数目总体呈上升趋势。这一行政区域的建构明显反映出琼斯的“思想——区域链”各环节的互动关系。伴随着西方殖民势力扩张的逐步深入，清末民初以后，我国西藏、新疆、蒙古等西部地区逐渐成为西方东方学关注的焦点。当西方人凝视并冒险涉足中国西部的同时，中国西部也经历着重新被发现并融入全球大历史视野下的境遇。作者认为民国时期实存在一场“重新发现西部”的历史运动，在此运动中，国人对我国西部地区地理空间的境象受西方殖民国家权力——学术话语的影响甚深。这一时期与嘉道咸时期边疆史地学研究不同的是，民国时期的学术体制发生了巨大的转型，大学教育、学术团体和专业论文期刊所组成的三位一体框架，成为中国边疆学研究的主要平台；其次，随着近代科举制的废除，中国知识分子精英阶层的生存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最后，民国时期的学术现代化转型，使学科专业分化日趋细密，很多学者开始采取语言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文化学、民族学等诸方法对西部地区进行认知与研究。在政府对西部开发大张旗鼓的宣传动员下，随着人类社会行为活动的不断介入，从而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崭新的西部空间格局。随后，作者通过对国民党抗战时期大批工业企业由东部向西部内迁，促使经济重心空间转移的变局，从长时段的角度出发，将空

间因素纳入到经济分析的范围之内，对西部经济开发中时间的演进与空间分布扩展之间内在互动关系以及对后世的影响进行了透彻的分析。

福柯认为“一部完整的历史仍有待撰写成空间的历史——它同时也是权力的历史”。空间乃是权力、知识等话语转化成实际权力的关键。作者在分析西部开发与近代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便把着眼点更多的倾注于西部“开发”话语背后所蕴涵的复杂的权力关系网络，从立场不同的话语交锋中去探询其“开发”话语背后所掩藏的空间内部冲突与张力。作者从民族国家建设的角度，用类型学的方法概括提出了近代西部开发过程中所呈现的四种类型：一、西北诸马军阀集团型。分析了西北诸马军阀集团在西部开发等旗号下与国民党中央政府之间存在的权力争夺。如作者指出北洋军阀时期，政府在对青海、甘肃一带的实际治理过程中，实际背后存在着吴佩孚、冯玉祥、蒋介石等派系的权力利益争夺。由此作者认为，所谓“开发、现代化”的弦外之音极其复杂，背后实包裹挟携着激烈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权力斗争；二、自行其是的基层建设模范省：广西。作者分析了新桂系在广西的开发建设实践，认为新桂系在广西的施政可以说与杜赞奇描述的华北地区“国家政权内卷式”模式迥然有别，广西的民团，绝不是过去中国各省的民团，它是一种下层的军事、政治、经济组织，其以务实的态度从社会基层坐起，从而为探寻造就乡村社会新式精英方面进行了别具一格的制度创新；三、盛世才在新疆地区的开发。作者分析了盛世才主持新疆开发建设期间的是非曲折，从而展现了近代西部开发过程中，国家内部与外部之间复杂的政治和经济互动关系；四、延安道路：未来中国前途的灯塔。作者认为我们必须将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开发建设置于民族国家建构和现代化进程的宏阔大历史语境下去解析这种“延安道路”模式的内涵。指出陕甘宁边区的三三制、减租减息、农村合作社，都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富有创造性的制度革新。陕甘宁边区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雏形，在当时中国的政治空间形态中独放异彩，代表了中国未来的社会走向。

在中国古代以马匹作为驿传交通工具的时代，驿传制度成为我国古代在辽阔国土疆域内行之有效的递送系统。无论是西方还是古代中国的历朝历代，交通通讯、驿传制度都成为统治者不遗余力加以改良的重点，其目的在于加速国家政令信息自上而下的有效传递，提高政府的统治效率及对全国的控制能力。清朝在取得平定三藩叛乱、西征准噶尔、平准战役的胜利以及对西藏的有效管辖后，其版图达到了空前极盛。伴随着清王朝中央专制集权的不断加强、完善及清廷对边疆地区有效统治的确立，作为中央政令有效传输媒介的驿传制度，也在以前所未有的空间网络系统伸向并覆盖边疆各地。但伴随着西方帝国势力的入侵，西方近代交通体系、通讯体系的介入，从而使清代后期驿传体系渐趋沓泄废弛。古代马车时代被迫告别了历史舞台，一去而不复返。以铁路为标志的近代火车时代，伴随着列车的轰鸣与汽笛声，以其蒸气机活塞挤压气缸之加速运转般纷至沓来，从而打破了以往以驿站为传输路线的空间布局，同时也无疑地改变了传统时代人们心理上的时空感觉，使人们的空间距离感渐进缩短的同时，将每一分、每一妙的时间覆盖维度渐趋拉伸、延展，提高了时间的分辨率，从而用一种“共时性”的感觉逐渐取代了以往“历时性”的历史。因此，作者指出，铁路的出现密切了近代中国“中心”地域与“边疆”地域的关系。福柯也曾对铁路在近代的应用提出过自己的看法，认为铁路是一个空间与权力关系的新面向，必须放在社会性质与历史中考量。铁路造成了一些社会现象，刺激了人口的转化。有些法国人甚至认为，铁路可以提高人民间的熟悉以及创建一种人类普适性的新形式。美国历史学家拉铁摩尔也对近代铁路的应用情有独衷，曾在其《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中，明确指出铁路的应用与政治权力的控制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认为，随着 20 世纪的到来，铁路出现了。这是整个中国体制中所没有过的经济与政治力量的新产物。而且，它反映了西方影响的进一步深入，即从商品贸易发展到外国资本的直接投资。铁路不但带来了经济上的干涉，而且还有直接或间接的政治干涉。特别是铁路在东北地区的应用，拉铁摩

尔指出，由于铁路的应用，东北被结成了一个新的统一体。铁路在东北地区发生影响之早、之深，要甚于在中国内地，它们把各个地区之居民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联系起来。在这种变化中，产生了新的东北政治观念。[④]《中国西部开发与近代化》一书作者指出道路不仅是经济空间场的一部分，而且是经济要素流动的空间通道，而对这一道路控制的近代交通部，在北洋军阀时期乃是诸部中最为权重与富贵的机构，可见以铁路为标志的近代通讯体系的变革，其背后都彰显着空间、权力与经济流动之间的内在关联。

中国传统史学界一直以来强调中国国民性如何与土地关系密切，安土重迁。在费孝通描绘的“乡土中国”形象中，认为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土是它的本色，整个民族和土分不开，中国人以农为生，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人与空间的关系是不流动的。于是，中国文化被形容成一种农业土地的文明，恰好和所谓西方的海洋商业文明相反，成为两种不同的典型。然而台湾历史学家龚鹏程在《游的精神文化史论》一书中，提出中国古代决不是一个凝固稳定的乡土社会，而是充满各类游人流民以及游之活动的世界，流动才是社会真正的行为方式。这些游人及游的活动，显示了中国文化中非常丰富的精神状态。[⑤]众所周知，清代的人口膨胀、人口压力问题，早在康雍乾盛世时期就已埋下了隐患。据清代官方人口数字统计，乾隆二十七年（1762）人口数目首次突破2亿，到乾隆五十五年（1790）突破3亿，道光十四年（1834）人口数字又增长到4亿。然从全国人口分布的比例来看，东、西部人口空间布局却存在巨大差异。从胡焕庸提出著名的瑷珲——腾冲线看，清晰的表明了中国人口空间分布的巨大不平衡性。在近代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人口密度实际基本与经济密度成正比，即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也是经济密度较高地区，反之亦然。中国西部一片大漠枯瘠，地表自然环境恶劣，人烟稀疏，不能承载过多的人口。随着中国近代化历程的发展，东部人口压力负载过重的弊端、战争频繁的形式日益严峻，加之政府战时策略的转变等诸因素的影响，从而促进了中国由东向西的人口迁移，势必打破以往的人口空间分布格局。在整个西部近代开发过程中，西部地区成为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纾解人口压力的“安全制动阀”，成为波涛汹涌的人口洪峰通过时的“泄洪区”的同时，人口的流动、移民——游者也为西部的边疆开发、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从政府对待游者摇摆不定的举措中，我们可以看出政府在放任移民与保持稳定两大问题上存在互相权衡与博弈的一面。可以说，本书作者的眼光极其敏锐，一反以往史学界以精英史、精英文化为叙述主体的传统模式，而把着眼点聚焦于移民社会——一种另类的社会空间，给予下层民众的社会空间组织以更多的关怀。作者通过对西部移民社会内部的社会学分析，从边疆社会所具有的边疆性出发，提出人口的迁移给西部社会空间内部结构造成了：男女性别比例失衡、社会无序动荡、社会组织形态变异、土客矛盾凸现和社会文教落后五方面的影响。我们认为，诸如韩边外独立王国的出现，政府文教的姗姗来迟等现象，都表明移民社会所独具的地方性知识特征。

人与环境的问题，是任何时代都需要搞清的思想问题。在人类早期的地理思想中，环境概念的起源被认为是上帝或神有目的的创造。在古埃及，人们赞扬神灵为动物创造原野，为人类创造果树。在古老的中国，也有着女娲伏羲的神话传说，《山海经》记载的人们对地理环境的想象。可见，远古人类的地理思想与神学宗教思想往往相连紧密，人与环境的关系，实乃神与环境的关系。随着大地表面人文现象的日趋繁荣，人类创建景观，改变自然的能力渐趋萌芽。早在古希腊柏拉图的著述中，就已提到譬如森林的砍伐改变了景观并加剧了土壤向大海的搬运之言论。随着人类自主改造自然能力的增强，生态环境渐趋恶化，对人类的负面影响可谓深远。曾是原始森林遍布的黄土高原，如今已是秃岭荒山、千沟万壑、黄沙滚滚，一派荒凉之景。

西部开发主要是一个经济开发的问题，但我们并不能仅仅局限于经济开发本身，开发的同时还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单纯的从经济学或者经济史的角度去书写西部近代化，并不能很好的解决西部开发出现的各种问

题。作者在此书中力图扩展经济史研究的视野范围，将经济开发、近代化、生态环境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同时予以关照和考量。以往前人研究环境变迁，多注重人改造自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站在以人为活动中心，以人为本位主体的立场，将生态环境视为一种外在变量，被动的客体。作者在第五章中力图打破这一传统立足点，而将西部近代化过程构置于生态环境的语境中，以生态环境为本位，借用布罗代尔总体史观、长时段（又称地理时间）思想，以逆向思维去探讨生态环境的变迁对西部近代化所产生的影响，对边疆史、经济史等领域研究的思路不无启迪意义。

长城，作为历代统治者防止北方少数民族南下的军事屏障，作为世界上独一无二且延展辽远的人文地理因素，它促成了一条特殊的人文地带之形成。在长城的两端渗透着农业与草原两种势力，成为“农耕”与“游牧”两种文明过渡性的人为空间分隔线。美国历史学家拉铁摩尔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中，将自身放置在非国家的立场上，不论“文明”与荒蛮，超越政治与民族，站在大历史的视野下，将长城两端合观为一个“亚洲大陆”，提出“对汉族是边缘的长城，对整个亚洲内陆却是一个中心”。所谓“中心”的概念是，在长城的两侧，并立着农业与游牧两大社会实体，两大社会在长城沿线的持久性接触，形成互动影响，反馈到各自社会的深层。这一中心概念的建立，纠正了以往以南方农业社会为本位的立场。在进一步对长城的出现所造成的影响分析中，拉铁摩尔多次强调，在农业社会与草原社会的关系史中，主要是农业社会限定了草原社会，而不是草原社会“扰乱”了农业社会。⑥

《中国西部开发与近代化》一书作者在“从游牧社会内部发现历史”一节中，指出清代盟旗制度的施行，划定旗界，这一由蒙古习惯法上升为国家法律的历史过程，实与清代北部生态环境的变迁息息相关。一方面，划定旗界可以说是清王朝政府权力渗透到牧区后，对牧民生存空间的“栅格化”，而另一方面，划定旗界实与退化的草原生态环境趋势和状况相适应并对此趋势的加深具有缓冲的作用。我们从书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清代以来蒙古地区自身从“游牧”向“驻牧”的转变，其自身具有一种内在的农业化驱力，更多的是蒙古地区主动农业化的趋势。如果说内地的近代化主要以工业化为日趋，那么农业化可以说是蒙古地区的近代化的主要内涵和方向。蒙古牧业的农业化趋向之所以在近代日趋彰显，一是由于价值规律的支配和经济利益的驱动，一是由于生态环境恶化的影响，导致生存空间萎缩。

总之，笔者拜读《中国西部开发与近代化》一书，深感作者以西部的空间境象为叙述主线，力图打破以往学术界单一的以时间为主线的线性叙述结构，试图从空间所具有的延展性、空间网络渐进密化格局的形成以及时空之间的互动关系等诸多因素，视西部近代化不仅是一个时间的发展进程，同时更是一个空间交织网络不断扩展、梳密的过程，将空间的书写融入时间的演化进程之中，试图给读者展现一个兼具时空二维视角的复线历史的发展过程。该书致力于时空观念的变化对西部现代化进程进行解读，以新的学术思维、新的叙述模式将西部开发与近代化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它的示范性、创新性将给以后的中国边疆史研究带来深远的影响。

---

①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见福柯著《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第18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②Edward W. Soja著《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陆扬等译，第58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③唐晓峰《人文地理随笔》，第224页，三联书店2005年版。

④（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第70、89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⑤龚鹏程《游的精神文化史论》，第5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⑥唐晓峰《人文地理随笔》，第282页，三联书店2005年版。